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中华历代国宝之谜

—— Zhong Hua Li Dai Guo Bao Zhi Mi ——

王廷洽·主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

【 华 夏 文 化 典 藏 书 系 】

中华历代国宝之谜

下

王廷洽·主编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嘉祥画像石寓意之谜

嘉祥画像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艺术三大瑰宝。嘉祥画像石种类繁多，表现了许许多多的主题和故事。有人说，画像石反映了学术思想中多种思想混合的复杂状况；有人说，画像石代表了古人对生死的思想信念和礼仪习俗；有人说，画像石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反映。

嘉祥画像石出土于山东的武氏祠，位于嘉祥县城南30华里的武翟山村头，是东汉末年(公元145—200年之间)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组石构建筑上的画像石。总共有44块，这些汉代画像石画面题材内容之丰富、思想内涵之深邃、雕刻技法之精湛，居全国汉画像石之首，因为出土于嘉祥，所以又叫嘉祥画像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与同时期的埃及石刻、希腊瓶画并列为世界艺术三大瑰宝。

武氏墓群石刻石阙画面和画像石画面的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神话传说类、经史故事类、现实生活类。以每石中的一层为一组，共98组，每组有的是一个故事，有的是几个故事。

第一类画像主要反映了汉代



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老百姓的家庭饮宴、贵族们的狩猎郊游以及军事作战、亭台楼阁等。比如武氏墓群石刻前石室“令车”画像上，主车“令车”一辆，车上四维，车后四个



骑者，另有一辆“主簿车”，一个送行者。主车前有两人骑马，带剑骑士两人，步卒两人，迎者一人。这些情况同当时的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完全反映了汉朝人的生活。

第二类着重是历史故事。这部分题材主要反映了汉朝以及先秦时期的历史故事。并借助这些故事来宣传诸侯名臣、孝子义士等。嘉祥汉画石的历史故事中首先体现便是对忠臣的赞美，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周公辅成王的画像，以及为彰显忠义之士而作的“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等。嘉祥汉画石还有刻四组八个十三处孝亲故事，如“老莱子娱亲”、“汉休屠王”等。

第三种则是神话传说。该题材中占主要地位是天神雷公、风伯、雨师等；另外一些是传说中的圣君祖先有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神话部分的画面内容极为精彩，实为中国艺术史上绚丽多彩的珍品。

嘉祥汉画石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了中华民族演变、融合的发展轨迹，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道德等方面的缩影。但它到底是刻在坟墓里的，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定论”，作为刻在坟墓里的画像，它除了装饰作用

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用处呢？古今中外一直有不同的见解。

有人认为嘉祥汉画像石反映出汉代学术思想中多种思想互相渗透，儒学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复杂状况。虽



然说汉朝自汉武帝开始便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这并不说明，儒学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汉代提倡孝道、盛行厚葬、崇尚道家升仙思想的结果，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汉画像石中只有孝道的故事画面，这些都来源于早期未被利用的儒学和传统的道家的思想。这也和当时统治者实际的政策相吻合。汉代统治者表面上采纳董仲舒等的主张，实际上他对各派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在个人生活上他们笃信得道成仙的观念，千方百计寻找长生不老药；在政治上他实行的是“外儒内法”。社会的大风气也影响着百姓坟墓的装饰，反过来，老百姓的坟墓装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另外有人认为嘉祥画像石表现了汉代人对于生死的思想信念和礼仪习俗。观察嘉祥图像石上的图像我们发现几乎每块画像都充满了对人死后升仙所带来的喜悦和欢乐，人和动物无不处于飘逸洒脱状态，毫无悲哀痛苦之感，可见当时的人们把死当作了“极

乐”，这与秦汉皇室的兵马俑墓葬严整呆板的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画像和石墓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空间。它的特殊精神功用就在于，画像石墓的主人——死者从这里得道升仙；而间接的受益者则是家族亲属和邻里。直系亲属凭借如此精美的墓室来表现自己的孝心可以举孝廉、受美誉；亲朋邻里们则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公共空间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寄托。因此，这种“双赢”的建墓方式自然产生了如此多和精美的画像石。

还有人则用内部心理因素来解释嘉祥汉画像石。认为它所刻画的非现实世界——天国仙境，想像丰富形象夸张，表现大胆充满激情，以“画”代话，用形象化的图画语言表达了幻想。表明在汉代人的记忆里还大量保留着人类史前时期的行为和冲动的记忆，可以说他们比我们现在更接近原始人类。汉代人幻想的仙境是汉代人把原始社会无意识的精神生活，转换为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自由梦想。因此，嘉祥汉画像石或者说是汉朝的画像石更直接、更有力地把汉民族的深层心理活动刻画在石块上了。



嘉祥汉画像石究竟承担起了如何的功用呢，现在我们的种种见解都只能是揣测，画像石真正的功用恐怕还是传播文化，将老祖宗的历史流传下去，其余的功用也只是附属品。

熹平石经颠沛之谜

《熹平石经》是中国第一部官定的石刻经书，从选择经书文本到最后的书写都极其认真。20余万字的碑文出自东汉末年著名书法家蔡邕之手，堪称一代精品。惜乎国宝命运多舛，《熹平石经》从董卓火烧洛阳城开始屡遭厄运，甚至沦为造房子的基石。时至近代，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残存的《熹平石经》又在井下度过八年抗战，直到抗战之后，《熹平石经》历经波折才回归碑林。

在西安的碑林里有一些残碎的石碑，虽说它们表面上都已经残破不堪，完全不能和碑林中的其他又高又大的碑刻相媲美，但这些石碑却仍然被人们非常小心的保护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现在表面看上去残破不堪的石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定的石刻经书——熹平石经的残片，中国的学术和书法以及镌刻水平的第一次完美的结合就是熹平石经。上面曾经密密麻麻刻满了经书。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把经文刻在石碑上呢？

我们知道，汉武帝为了统治天下人的思想，实行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保我利貞制勅衆祿萬惡混平同遊三元迴
光及嬰坐在立亡侍我六丁猛獸衛身從以
朱兵呼吸江河山岳積傾立致行厨金醴玉
漿收東青豹吐吃幽冥役使鬼神朝伏千精
所願從心萬事刻成公道散軀恣意化形上
補真人天地同生耳聰目鏡徹視黃寧六甲

从此儒学一跃而成为封建的正统学说。西汉中后期，儒学大师们针对当时社会各项制度不完备的现实，用儒家经典阐述微言大义，有的人还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中去。东汉建立之后，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随着他们对古文经研究的深入，迫切感到要尽快规范经书的书写来规范整个学术的风气。而今文经学家讲究义理之学和经世致用，用所谓的“微言大义”的方法，不顾文献本身的意义而牵强附会地望文生义。儒家经典的今古文之争越演越烈，东汉朝廷为了平息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因为许多争论是因文本的文字或句子出现的差别而起。于是在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灵帝批准后，

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利用碑刻的形式来统一今古文之争，也反映出这些学者们希望自己所做出的书写规范能和石碑一起流传千古的内在心理。

在镌刻石碑前，首先由学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

玉女為我使令畢乃開目初存思之時當平
坐接手於膝上勿令人見見則真光不一思
慮傷散戒之
甲戌日平旦黃書黃素宮玉女左靈飛一句
上符沐浴入室向太歲六拜叩齒十二通頓
眼一句十符祝如上法畢平坐開目思黃素

进行参考比较之后，选择其中最好的本子，确定为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当时书法第一流的国手蔡邕用朱砂笔以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这项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石石经”。

玉女十真同服黄锦帔紫罗飞羽希头並翬
雲三角髹餘疑散之至魯手執神虎之符乘
九色之鳳白鸞之車飛行上清晏景常陽迴
真下降入地身中地便心念甲戌一句玉女
諱字如上十真玉女悉降地形仍叩齒六通
泗液六十過畢祝如前太玄之文

熹平石经镌刻竣工后，立于洛阳郊偃师县太学（当时国立最高的学府）的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行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

可是如此气势宏伟的石碑仅仅辉煌了七年，便开始了它多舛的命运。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董卓退守长安，临走之前放火烧毁洛阳城，其下属则对偃师的太学肆意破坏，石经开始被损坏。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北齐高澄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

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

1931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从洛阳买到《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存字450字，非常珍贵。1936年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为了更好的保护石经，张鹏一又挖出了它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惟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于右任的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张文生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三原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风行隶书、



碑刻盛行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说现在完整的熹平石经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自宋朝之后，不断又有残石出土，据说现在已经集存了8000余字，终于也可以让我们一窥熹平石经的原貌。

正始石经碑文书家之谜

中国的经学源远流长，三国曹魏时候雕刻的《正始石经》更是其中的珍品，因为其中一块碑刻上，不但雕刻了三部著名的古文经书，更重要的是碑刻上的文字用三种字体书写而成。三国时期，究竟是哪位著名的书法家能够用笔同时写出端庄的隶书、严谨的篆书和古朴的古文？是竹林七贤的嵇康？还是魏国书法名家卫觊？这一切都成了不解之谜。

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是中国第二次石刻经书，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正始石经》因为是用古文等所刻成，所以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这样一块重要的石碑，它究竟是由谁雕刻的，却一直存有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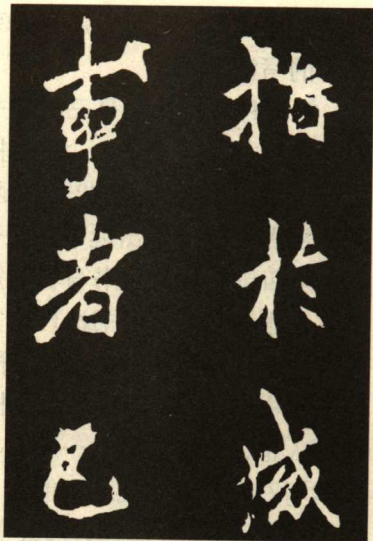
谈到石刻经书，自然要讲到经学。中国的学术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恐怕就要属经学了，自汉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春秋战国时期的

儒学著作奉为经典，要官员们和老百姓们牢牢记住，并运用这些经书进行来治理天下。东汉末年由蔡邕所书写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石刻经书，用隶书写成立于太学门外，对普及经学规范经书的格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东汉末年的董卓火烧洛阳城，导致《熹平石经》被毁于一旦。到了曹魏的时候，和平的岁月催生出文化的需要，当时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对于经学再进行一次整理，并仿效《熹平石经》，将整理好的经书刻在石头上使之流传千古。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古文经学的势力抬头，认为熹平石经所刻的是今文经，故古文经学家不服气，所以也要正式颁布古文经。

《熹平石经》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所写成的。为了更好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在雕刻石经的时候，当时的文人学者决定用三种字体（古文、小篆、隶书）来雕刻石经，其中的古文采取的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写法，因而极具价值，因为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所以石经叫《正始石经》，又因为经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所刻，故又称《三体石经》。从曹魏正始二年（241）开始，总共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总共立有48块石碑，共有十四万七千个刻字。其后也许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和朝廷的更替，《正始石经》就再也没有雕下去。

《正始石经》无论对研究经学还是战国古文字，都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尤其自晚清至近代以来，海内外学者考证这部石经以及研究它的内容和文字的著作很多。但这些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呢？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第一种说法认为《正始石经》是出于汉魏间的著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南梁时期，袁昂在《古今书评》评价邯郸淳的书法“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北齐魏收在《魏书》提到：“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唐人李延寿的《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清人阎若璩、孙星衍等。



第二种说法则将《正始石经》的作者定位魏国书法名家卫觋。卫觋系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是三国时期与钟繇齐名的最著名的大书法家。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觋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时，深得曹氏亲信。说卫觋书写《三体石经》最早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觋）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为武、冯登府及近人杨守敬也都主卫觋书写，他们认为如果石经不是卫觋写的，所谓得“石经失淳法”又为什么要写在

卫觐传里面呢，正因为是卫觐写的，所以才要特别声明与邯鄲淳的写法不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中根据《魏书·江式书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精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

第四位被认为是书写者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的书法很有名，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称赞他说“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而与嵇康同时代的赵至则说亲眼目睹嵇康书写《三体石经》。《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零，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的儿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及周贞亮等根据这两条史料也都主张石经是嵇康写的。

而另有一种说法则认为出于邯鄲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在《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著作中凡是提到“石经”、“三体石经”、“邯鄲淳”和“正始石经”等条目时释文等皆取此说。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综观上述六种说法，都可谓有道理。那么到底是谁书写了《正始石经》呢？经过对上述说法的考证，再加上对碑刻

本身的研究。近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所写就。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国学大师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说《正始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一起书写的。但讲到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书写石经时，由于原碑毁损严重，出土残石中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再加上文献中业缺乏记载，只得暂时存疑，直到有新的史料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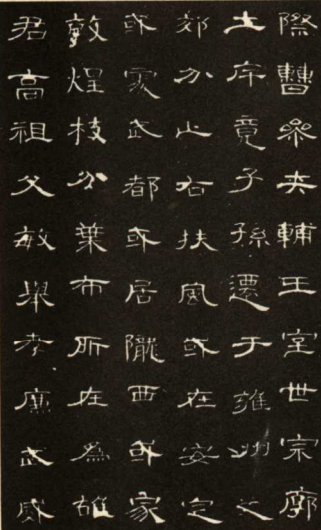
《正始石经》的原石到北魏时期还保存在洛阳，孝文帝时，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今洛阳)刺史，取石板以建寺庙，这部石经遂遭毁坏。到清朝为止，只有残碑的拓本流传，石刻本身从清代光绪年间起，《正始石经》碑版的残石数次出土于洛阳地区，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正始石经》的残片与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残片一窥中国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



天发神讖碑下落之谜

中国古代的诸侯们一个个都想着做皇帝，都想得到老天爷的帮助，于是乎个个抢着表明自己是老天选定的皇帝候选人，于是一篇篇碑刻涌现出来，《天发神讖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天发神讖”究竟是什么意思？《天发神讖碑》的鸡爪篆又是什么样的？这块著名的碑刻到底还在不在人世间？何以数十年来存在着迥异的两种说法？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个皇帝梦开始来寻找答案。

三国时期碑帖的书法特征主要是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三国除了曹魏之外，西蜀是确实没有石刻的，东吴的石刻也



不多，以《天发神讖碑》最为著名，但是正是这块少见的东吴碑刻，其最终的归宿却是一个难解之谜。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所说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所说魏国的书法无不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和写经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碑版有《受禅碑》、《上尊号碑》、《孔羨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等，书写经书

的有魏正始《三体石经》等等。可以说是一派繁荣，但由于曹操以“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为理由，而严禁私人立碑，所以这时期的碑版虽然有些很优秀，但总体并不多。

作为曹魏同时期的吴国地处江东，其书法诡异与中原大不同，大有楚风。所以，吴国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而其中最出名当属《天发神讖碑》。《天发神讖碑》亦称《吴天玺纪功刻石》，三国吴篆书碑刻。话说公元264年东吴皇帝孙休死后，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定，大臣们决定要推选一位年长的宗室来继承皇位。于是选来选去，选中了宗室中最年长的孙皓来继承皇位。可是孙皓的名声并不好，为人残暴。继帝位后更加昏庸残暴，政局

日渐险恶。276年，改元天玺，为了稳定人心，于是制造天降神讖文的舆论，以为吴国祥瑞而刻此石。《天发神讖碑》的“讖”字正是预言的意思，表明老天也同意孙皓做皇帝，所以此碑又叫《吴传皓纪功碑》。

《天发神讖碑》在天玺元年(276)立于建业(今南京)，相传是皇象所书(一说苏建书)。碑石在东晋刘宋时已断为三段(一说原是三石相垒而成)，因有《三段碑》之称。全碑第一段21

